

另眼看

LINGYANKAN
JINSHANG

——兼论新晋商发展趋势

晋商



李永福◎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另眼看晋商

——兼论新晋商发展趋势

李永福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眼看晋商——兼论新晋商发展趋势 / 李永福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77-0980-1

I. ①另… II. ①李… III. ①晋商—研究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6137号

另眼看晋商——兼论新晋商发展趋势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8043

网 址: www.beijingtongxin.com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70毫米×240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50千字

定 价: 29.80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绪 论

一个时代有一时代主旋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发展经济得到应有重视。在导向指挥棒的作用之下，梳理相关历史资源，使之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潮流。对晋商的研究工作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展开的。

一般的概念，明清两代，晋商曾驰骋商界五百余年，并与徽商并列为中国旧式商帮之首。尤其在清代中后期，由于经营银两异地汇兑业务票号业的横空出世，更提升了创办并长期垄断此业务的晋商的地位。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有关晋商的学术专著、论文、课题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各种原因，却留下了些许误会，用学术术语讲，可称之为“误读”。

误读之一是将晋中商人想当然为晋商，尤其对外地人而言，在他们的思维定势中几乎形成“共识”。之所以有此误会，依笔者之见，首先在于晋商大多数实体资源主要集中在晋中地域，其中以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庄园，灵石的王家大院等为明显标志，民间受此影响颇深。

其次，晋中市各级政府比较注重历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常家庄园。去过常家庄园的游客不难看出，该庄园其实是一个复古式建筑群，即在原址上恢复原有的规模和面貌，而如此做法，既需要一定的胆识，同时投入亦不菲，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相当程度上丰富了当地的晋商实体资源。

再次，当地各级政府比较注重品牌营销。起初是乔家大院不经意间被选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拍摄的主要外景场地，受益之后，进一步培育资源，在央视一台黄金时段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无疑为最成功的案例，此后在同台同时段上映的电视连续剧《走西口》，虽说在艺术表现手法和历史背景上有瑕疵（仅为个人观点），但观众在潜移默化间强化了对晋中商人的认知，流风所及以至于在相关影视作品中出现了晋中方言占据晋商话语权的现象。

最后一点，专业性资料片也有弱化山西别地商帮的趋向。由山西省委宣传部组织海内外研究晋商专家拍摄的20集人文纪录片《晋商》，在总框架中，清代以前的篇幅占比极少，反映清以后历史的介绍中，鲜见山西别地商帮的影子，几乎是晋中商人在唱独角戏，而如此编排尤其与史实不符，相当程度上固化了观众对晋商的判断。也正是以上诸因素的叠加作用，才造成一般民众将晋中商人等同于晋商的误解。

不唯如此，在更高层面上，即专业之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多数人对晋商源头何在、晋商发展脉络等基本常识同样存在误读现象，认为晋商仅仅是明清两代的产物。以上判断并非危言耸听，实在是笔者的亲身经历。前年笔者有幸为省委组织部组织的干部学习班做过一期讲座，题目为“近代视野下的晋商”，受众为处级干部，其中包括部分双肩挑的专家学者。在休息间隙的交流中得知，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知晋商源头何在，对晋商发展脉络更没有明晰的头绪，要知道他们大多是山西籍知识精英，他们的见解如此，更遑论外省人及海外华人对晋商的认知。

时下多数学者在他们的学术成果中重点罗列晋商的辉煌业绩，对成就晋商的主客观因素虽也有评述，但侧重于晋人的主观努力，而对客观条件总体分析不够，难免受到外省籍学者的诟病，如此效果只能称之为

“墙里开花墙里香”。笔者的观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华文明圈内各地民众的智商并无所谓的高低优劣之分，他们在商业上的差异完全受制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的限定。

天时方面，笔者简单概括为“屡次享受政策的阳光哺育”。明初，晋人受益于“开中制”，北方九边镇中，山西占据了两家，即大同和太原（围绕神池诸堡的布防，重点镇守晋西北地区），况且该政策是以两镇为试点单位。明代中期，朝廷改行“开中折色”，即商人缴纳现银就可以获得政府特批的盐引，有实力的晋商逐步占据各大盐场，其身份也衍变为“内商”。当然，还有“隆庆议和”的强力推动，北方边境难得的休战期，不仅极大降低了明朝的军费支出，而且开启了与北元蒙古族的常态化经济交流，晋商受益颇多。整个明代，中国商业领域势力最为显赫的当属盐商，而晋商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按说清初祖籍晋中的“八大皇商”并非晋商主流，但他们的得势同样来自清廷的特许政策，无论是深入“龙兴之地”（东北的皮货等）的特产贸易，还是与日本的洋铜买卖，抑或与蒙人的商品交流，如若缺失了朝廷的许可是难以想象的。况且他们在各大盐场也占有一定的份额，而如此地位依然源自清廷的授权。

清代中后期朝廷对蒙古地区有限度的开放，使得占据地利之便的山西再次站到历史的制高点上，最直接的后果是促成了这一时段晋商的主流——旅蒙商的兴起与繁荣。而让晋人最为自负与自豪的票号业，至少在政策层面上，几乎没有税费的负担，极大地降低了经营成本；再加之部分省关的官款在清廷的默许下改由民营的票号业汇兑，进一步拓展了营业范畴，其盈利能力和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直至今日还让新晋商艳羨和顶礼膜拜。需要说明的是，其时山西别地商帮并没有衰败，他们仍延续原有商业网络稳步经营，且取得不错业绩。

地利因素与天时因素密切相关，历史上不同的政策导向会对地理环境产生迥异的利用价值。山西地处华北平原，南枕河南，西界陕西，东与河北接壤，这些地域皆是农耕文明，与山西的经济基础基本类似。山西的北部是广袤的蒙古大草原，游牧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与农耕文明存

在强烈的互补性，鉴于此，笔者将山西的地利概括为“占据异质文明交汇区的孔道”。

在司马迁笔下，山西的空间概念为“表里山河”，冷兵器时代，与周边地域山河相间的地理特征往往成为动荡时局的凭借，而历朝历代沿中北部地域逐次扩展的民族融合进程印证了山西地利的价值所在。

明代大多数时段对蒙古的政策为经济封锁，为此在北部边防沿线设置九关，常驻 80 多万、最多时达 120 余万戍边将士的生活用度，以及几十万匹军马的粮草供应，对临近地域的商民而言无疑存在巨大商机。山西有幸开设两个边镇，且距离别的边镇亦不远，“开中制”所涉及的主要交换筹码食盐和粮草，山西也不缺乏，河东盐场为其一，而河东地域（主要包括今运城和临汾两市所辖县、市、区）自古号称山西粮仓，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该政策在山西所具有的地利优势，其中经营成本相对较低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中后期的“开中折色”，只不过是商人缴纳的粮草布帛改为实银，北方戍边将士的生活需求与战马的粮草供应依然如故，是故商机并没有失去，况且因官方在北方边镇开设的时断时续的“茶马互市”和民间“私市”的刺激，相较于以前，还增添了商品种类和增加了供给量，地利因素再次发酵，即晋商在经营相关贸易时，可以就近获得相关商品，而空间距离比较接近的优势，带来的是运营成本的相对下降，进而提升了晋商的竞争力。

清代，晋商有两大标志，前为旅蒙商，后为票号商。由于实现了民族融合，至少在康熙完成统一大业（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多伦会盟为三大标志）之后，以前被视为禁地的蒙古草原逐步对民间开放，明代“官市”与“私市”存续期间的磨合经历，以及清代开放之后的进一步了解，使得占据地利之便的晋商又一次站在制高点上，先是了解蒙民的生活所需，然后组织货源，而其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直令后人敬仰。

部分当代学者将旅蒙商的兴盛归结为人为努力，诚然在克服自然因素，尤其是交通、气候等条件的制约方面，晋商确实表现出相当的忍耐力和克服能力，但地利因素依然要考虑进来，如若没有前期的熟悉商情，

不可能有以后的大发展，这一点是中南地域的商帮所不具备的。最具代表的例子就是祁县乔家的发家史，先是始祖乔贵发在口外做粮油米面生意，到三代乔致庸时，重点经营茶叶贸易，当然还开办了两家著名票号，如此局面根基于长期的商业实践，而距离蒙古地域较远的商帮运作起来困难要大得多。

人和因素集中在两点，一为土狭人稠的生存压力，二为商业示范效应所带来的价值观转向。如若细细探究，其实两者是互为作用的，当然也与“表里山河”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传统时代，完全开发地域的人口总量与其土地承载力互为制约。明清两代，山西几乎没有可供开垦的荒地，解决人口压力的途径只有前去尚未开发地区谋生，明代中后期的“走西口”之所以充满艰辛，一者，沿途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二者，因为当时的蒙古地域还是与明朝对峙的政权，所以拓荒者还受制于冒险犯难的政策瓶颈。清初政权稳定之后，山西再次重复明朝“人口迁移故事”，这一次增加了以张家口为基地的“走东口”，包括晚清的“闯关东”也不乏晋人的身影。

为之铺垫的是明清两代山西人口规模变化不大，明初以洪洞大槐树为集结点的人口大迁移，旨在弥补元末农民战争造成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人口大量损失。明代中后期，当山西人口规模超过土地的承载力，晋人不得已选择了外出，以寻求生存空间，这一次是民间自发行为。

清廷基本没有主导过全国范围的人口迁移，但在休养生息之后，山西人口一直保持在千万级规模。该数据虽与明代和清初的统计有较大出入，但对历史稍有了解者不难窥见其中的原因，即康熙年间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所带来的统计数据真实性，“人头税”的取消使得一般民众没有必要再隐瞒“丁口”的确切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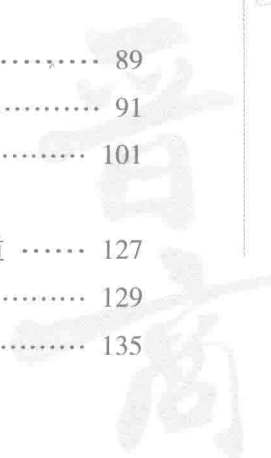
与时下流行的观点不同，笔者以为，明清两代山西人去口外谋生，大多选择了开垦荒地，仅有部分人从事商业。明代晋商唱主角的是盐商，清代山西在蒙古地区的首批商业拓荒者大多出身草根，祁县乔家的乔贵发、榆次常家的常威是其主要代表。因商业成功而带来的超预期回报，晋商商号员工所享受的令人羡慕的高待遇，以及科举考试“由士入仕”

的低概率和官场潜在的风险，综合考量下的价值趋向，颠覆了山西固有的民风，有相当部分家庭将俊秀子弟选送到商业领域发展，而这些人的成功又会昭示后来者，形成了最直接的示范效应。

“以史为鉴”是历史学的基本功用，笔者“另眼看晋商”的目的旨在为新晋商服务，以便能够从前辈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有益成分，进而结合时代和山西的区位特征，为新晋商规划出科学发展战略。以上思路和框架完全取之于笔者申报的山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新晋商发展战略研究——基于旧晋商经验的启示》，因在正文中要展开评述，在此不做赘言。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寄望于笔者的建言能够有助于新晋商的科学发展。

目 录

第一章 晋商概览	1
一、山西行政区划衍变	3
二、晋商源头在河东	12
三、山西雄厚的商业底蕴	19
四、商帮时代与晋商名号	33
第二章 “雾里看花”真晋商	47
一、晋中与晋中市	48
二、误读晋商原因面面观	64
第三章 成就晋商的天时观——屡次享受政策的阳光普照	89
一、散商时代的天时观	91
二、商帮时代的多重政策红利	101
第四章 成就晋商的地利观——长期占据异质文明交汇区的孔道	127
一、散商时代的地利观	129
二、商帮时代的“地邻极边”与蒙古内附	135



第五章 成就晋商的人和观——人口压力和商业示范效应的导引	151
一、人口压力	155
二、商业示范效应的导引	162
第六章 新晋商发展战略——基于老晋商的启示	173
一、何谓新晋商	175
1.老晋商的实力和影响力	176
2.新晋商主要代表人物	180
二、老晋商成功经验概总	184
1.因势利导的捕捉商机能力	184
2.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	190
3.放眼天下的经营视野	196
三、新晋商发展趋向	202
1.新晋商现状	202
2.新晋商发展路径	206
参考文献目录	235
后记	240

晋

商

第一章
晋商概览

严格意义上，晋商属于历史概念，从学理上讲，其范畴应包括华夏文明史上籍贯隶属今山西地域或以山西为创业平台并定居于此的商人。

晋商是今人对山西商人的简称，原因很简单，今天的山西缘起周初封国——古唐国，因晋水流经，后改称为晋国，并以方圆不足百里的小诸侯国成为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

战国以三家，即韩、赵、魏三卿分晋为始，所以在明清文人笔下，当时的山西商人又有一种称谓——“三晋商人”。

另两种比较普遍的叫法为“西商”和“山右商”，究其原因，与山西东部沿线的太行山关系甚大，由于山西位于太行山以西，按照方位居山之右，也就有了相关名号，当然，它们的叫响同样仰仗明清两代的文人墨客。

其实，历史上今天的山西地域亦曾被称为“山东”，其参照物为崤山和函谷关。南宋以前，中国的政治重心以陕西西安和河南洛阳、开封为易位，以陕西为中枢的时代，现代的山西地处崤山和函谷关以东，也就约定俗成为“山东”。

一般的常识，世界文明发轫于农业领域，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之后，才衍生出手工业，而商业的出现，则根基于各个行业剩余产品的出现，由此催生了相互交换、各取所需的强烈愿望。作为地域性商帮，晋商在历朝历代的名号虽有差异，但其衍变进程基本循此文明发展轨迹。

笔者的判断是以明代为分水岭，此前属于“散商”时代，即商业运营基本没有相对成熟的销售网络和比较固定的客户。明代以后则进入

“商帮”阶段，其主要标志为呼朋唤友的群体行为，为此各商家纷纷设立总分号，并在销售目的地筹建了类型不一的商业会馆。对历史上山西行政区划的变迁有了比较清晰的思绪，才有可能知悉山西商人各种名号的来龙去脉。

一、山西行政区划衍变

一系列现代考古成果都印证了豫西、晋南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以此为铺垫，民间传说或称之为神话时代的尧舜禹三位帝王的历史有了实证依据。

史料记载中的黄帝与炎帝大战之地阪泉，经专家反复论证，多数认同在今山西南部运城盐湖区的解州办事处。其后的唐尧、虞舜、夏禹活动中心圈定在冀州大地上，而冀州的中心当在晋南，所以在解读《左传》时，孔颖达有如此评判：“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距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

所谓“治”，即治理、管理的意思；而平阳，在今临汾一带；蒲坂，在今永济市蒲州镇附近；安邑，大致在今夏县至运城北一线，即夏县禹王城附近，所以主流学术观点称晋南为上古帝王之都之所在，以及为先民的主要活动中心的判断应大致不谬。

阶级社会初期，山西能够代表夏文明的是夏县东下冯文化，该文化遗存面积约25万平方米，主要遗迹有房屋基址、陶窑、水井、壕沟、墓葬等，遗物有铜器、陶器、石器、骨器和卜骨等。现有研究成果表明：河南二里头和山西东下冯差不多是同时的，至少目前还无法断定谁早谁晚，它们都是夏文化，晋南和豫西都是夏族和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区域。

以现有山西版图对照商代的行政区划，仅有晋南黄河北岸小部分地区归其统辖，而其他地域，则大多是与商朝同期的领地和方国。既为“领地和方国”，说明其经济与文化相对落后，河谷农业文明的优势再次显现。这里的河谷，在当时主要指黄河和汾河的灌溉农业，当然也包括涑水和浍河流域。

进入周代，在分封建制之后，以“夏墟”为基本框架的晋国逐渐强大起来，尤其在晋文公时期，通过会盟诸侯，最终确立为春秋五霸之一。

三家分晋后的韩赵魏三国，前期都城皆在山西，与晋北开拓相关的是赵国。赵国奠基之地在古晋阳城（今太原市晋源区），究其原因，诚如学者的分析：“赵简子、赵襄子父子在参与六卿斗争和对外开拓的过程中，看到了太原盆地及其周边戎狄族文化特点，认识到只要占据了太原盆地，便可北融群狄，南制诸卿，建立国家。是以把太原盆地确定为建都立国的战略中心。”^①由此而知，在古晋阳建都之前，当地已经成为晋国版图，换言之，以黄河中游为缘起的华夏文明在逐步扩大影响的范围，而其背后的重要筹码和支柱则是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

秦代实行郡县制，属于今山西的有5郡，即太原郡、河东郡、上党郡、雁门郡及代郡（部分地域在今山西辖境）。

西汉初期，为稳定统治，曾推行分封制，但大多时段基本沿袭秦朝的郡县制。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在全国设置13州刺史部，山西地域除河东郡（隶属司州，管辖今临汾与运城两市）外，皆属并州刺史部。不过此时州刺史部还不是一级政权，到东汉以后，州的建制才被列为地方行政机构。

王莽时期，颇多改革措施。行政方面，改州刺史部为州牧，“郡、县尽易其名”。^②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改名兆阳）、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隶属司隶校尉管辖。今山西境内别的郡，即太原郡、上党郡、雁门郡（改名填狄）、代郡（改名厌狄）隶属并州州牧管辖，而西河郡（改名归新）则隶属朔方州牧管辖。

东汉废除王莽政区建制，恢复西汉旧制，同时省并县邑。今山西境内有东汉76县，分属太原郡、上党郡、雁门郡、定襄郡、代郡、西河

^①范世康等，《中国古都研究》（二十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②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七《汉纪二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172页。

郡、河东郡7郡，此外，常山国（国都在今河北省元氏县北）管辖今山西者仅1县，即上艾（治所在今平定县南新城村）。

三国鼎立之时，山西属魏国管辖。魏之政区基本沿袭东汉旧制。东汉后期，州成为一级行政，为州、郡、县三级体制。今山西地域，除河东郡隶属司州外，余属并州。需要说明的是，在正始八年（247年），分河东郡之汾北10县置平阳郡，自此以后，河东地域发展为两个行政中心，即平阳郡与河东郡获得同等的行政地位。

西晋时今山西地域共计67县，属司州管辖的有二郡，即河东郡和平阳郡。并州管辖二国四郡，即太原国（西晋封子弟以郡为国）、西河国、上党郡、乐平郡、雁门郡、新兴郡。

十六国时期，与山西相关的有以下政权：匈奴族刘渊所建汉国，在全盛时辖今山西雁门关以南的广大地域。行政方面，设立司隶校尉，领平阳、河东二郡；并州，领太原郡、上党郡、乐平郡、新兴郡四郡，另有秀容1护军；幽州，所领大致确定为西河郡；冀州，所辖郡县不详。

羯族石勒所建后赵，最盛时据有今山西全境。行政系统，司州领平阳郡；洛州领河东郡；并州领太原郡、上党郡、武乡郡、永石郡、雁门郡、新兴郡、乐平郡7郡；幽州领代郡，辖县在今山西境内仅有平舒（治所在今广灵县平城村）1县。

前燕占领今山西地区后，设立66县，分属中、洛、并、幽4州。其中，中州领平阳郡；洛州领河东郡；并州领太原郡、上党郡、武乡郡、乐平郡、雁门郡、新兴郡、西河郡7郡；幽州领代郡，辖县在今山西境内仅有平舒（治所在今广灵县平城村）1县。

前秦在山西的地方行政系统分属雍、并、幽3州管辖。其中，雍州辖5郡，今山西有其两郡，即河东郡、平阳郡。并州辖8郡，即太原郡、上党郡、武乡郡、西河郡、雁门郡、五原郡、新兴郡、乐平郡。幽州领代郡，辖县同前燕。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西燕在今山西所领绝非上党、建兴2郡，河东、平阳、太原、新兴、乐平、武乡郡当属西燕，合为西燕8郡。

后燕全盛时，在今山西据有并、雍2州及幽州代郡1县。其中，并

州辖太原郡、西河郡、雁门郡 3 郡。雍州辖上党郡、建兴郡 2 郡。幽州情况与前同。其时夏国曾占据今山西河东地区达 8 年时间。

后秦据有今山西南部，计有 2 州 3 郡 20 县。其中，并州领河东郡、河北郡 2 郡；而冀州仅辖平阳郡 1 郡。

北魏地方行政区划为州、郡、县三级制，州置刺史，郡置太守，县置县令。属于今山西的有 13 州，其中，恒州领代郡、善无郡、繁峙郡、高柳郡、灵丘郡、桑干郡、平齐郡 7 郡。朔州领太安郡、神武郡、广宁郡、太平郡、附化郡 5 郡。云州领盛乐郡、云中郡、建安郡、真兴郡 4 郡。蔚州领始昌郡、忠义郡、附恩郡 3 郡。显州领定戎郡、建平郡、真君郡、武昌郡 4 郡。并州领太原郡、上党郡、乡郡、乐平郡、襄垣郡 5 郡。肆州领永安郡、秀容郡、雁门郡 3 郡。晋州领平阳郡、北绛郡、永安郡、西河郡、冀氏郡、南绛郡、义宁郡 7 郡。建州领高都郡、长平郡、安平郡、泰宁郡 4 郡。汾州领西河郡、吐京郡、五城郡、定阳郡 4 郡。东雍州领邵郡、邵上郡、高粱郡、正平郡 4 郡。泰州领河东郡、北乡郡 2 郡。陕州领河北郡 1 郡。由于史料残缺，部分郡县地址已无从考。

东西魏并立时，今山西省境除西南部属西魏外，大部分属东魏。东魏的地方行政设置多数与北魏同，仅在晋州辖境内添加北五城郡、定阳郡、敷城郡、五城郡 4 郡。西魏统治的晋西南，泰州名号未变，增加了河北郡。此外，还将东雍州改为华州，南汾州改为勋州。

北齐代东魏而兴，今山西地域除运城市外，九成以上的面积属北齐所有。地方行政，州、郡两级几无变化，仅在县治上有所增废。

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后，在今山西设 16 州、18 郡、92 县。其中，虞州领河北郡、安邑郡 2 郡。邵州领邵郡 1 郡。蒲州领河东郡、汾阴郡 2 郡。绛州领高粱郡、龙门郡、正平郡、绛郡 4 郡。晋州领平阳郡、西河郡、定阳郡、北绛郡、义宁郡、永安郡、汾西郡 7 郡。建州领高平郡、安平郡 2 郡。介州领西河郡、介休郡 2 郡。南汾州领定阳郡、中阳郡、五城郡 3 郡。汾州领龙泉郡、吐京郡、临河郡 3 郡。石州领离石郡、窟胡郡、定胡郡、乌突郡 4 郡。并州领太原郡、乐平郡 2 郡。潞州领上党郡、乡郡 2 郡。肆州领雁门郡 1 郡。北灵州，州领郡。北朔州领广安郡、